

# 城镇化里的“美丽乡愁”值得期待

■关东客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公众的一种期待。然而当这种期待被正式写入中央城镇化的规划文件,公众的期待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的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得住乡愁”并不只是一个诗意的句子,更是民意在政

府决策里的诗意呈现。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1.27%。但是回顾城镇化走过的道路,伴随的是青山绿水的消失,居民耕地的大幅缩减,环境的污染,以及新城市贫困阶层的出现。很显然,这样的城镇化道路并非官方所想,百姓所愿。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最大特点是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不以牺牲环境和耕地为代价。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了诸如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理性

而又带有诗意的表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看似大白话的提法恰恰说明了政府对于过去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同时也是为以后新型城镇化建设指明方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这说的是自然层面的城镇化,而记得住乡愁则属于心理层面的城镇化。城镇化的主体不是城镇建设的好坏,而是新市民的认同,那些记得住乡愁的人的心理认同。而当前城镇化面临的重大问题恰恰是民众心理上缺乏认同,城镇化变成了有关部门的独角戏。

如何能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同时也是对领导者和决策者提出的新要求。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变市民,也不是平房变楼房,而是一个需要户籍、土地、社保、环保等多个部门互相配合的系统工程。事实证明,如果脱离了实际,违背了自然,没有市民的认同,推进城镇化就会困难多多,问题多多。一些地方大肆掠夺农民土地,赶农民上楼的做法就是典型的胡干蛮干。

新型城镇化的布局已经展开,任重道远,但相信只要按照“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思路走下去,我们一定能看到城镇化里的“美丽乡愁”。

## “土匪”城管

■文/小强 图/春鸣

8 日上午,湖北荆州一男子吃早餐时恰逢城管执法,“实在看不过去”,便上前理论,说了句“你们怎么能跟土匪一样”,便遭到十余名城管队员群殴,男子被拳打脚踢后满头是血,几名群众上前劝阻,也被在场的城管队员推搡。

有些心理特别独特又脆弱的人,犯了错误,被人指出来之后,不是虚心接受,或迟疑自省,反倒会勃然大怒,不惜以犯更大的错误来回应对方,尤其是当自己知道理亏之后,这种应激反应往往更加猛烈。你骂老子们是土匪,今天就证明给你看,老子们还真就是土匪,现场让你尝尝土匪的厉害。有句四川方言成语对此描述得很准确,叫“以烂为烂”,也就是文言中的“怙恶不悛”,总之是变本加厉地自甘堕落的意思。

在城管形象堪忧的当下,尤其要对城管这种蛮横霸道的打人行为进行严惩,要不会坐实“土匪”的称号。



## “干两天休一天”,有人“干十天休一天”

■张贵峰

在 12 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谈到:“一年 365 天,现在我们法定节假日 11 天,带薪年假平均 10 天,再加上 104 天的双休日,加在一起是 125 天,一年已有三分之一时间是休假。等于是干两天就休一天。”

按照一年休假日总量来计算,目前我们“等于是干两天就休一天”。面对这样的计算结果,相信很多公众都会产生一种“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的感觉。尽管“吓一跳”,但又不得不承认,依据我国现行相关制度法规,至少在理论上,“干两天休一天”计算结果,确实是准确无误的、并没有什么夸大其词之处。

但回到现实,又必须承认,所谓“干两天休一天”,在很大程度上不过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简单运算结果,还远远不是普遍存在的事

实,诚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且不论近年来落实状况一直差强人意的带薪年假制度,单只看看更为基础性性质的“一周双休”工作制的落实情况,便不难窥见一斑。

如日前调研机构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员工世界最勤劳”,“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 44.6 小时”。而按照目前我国法定的每天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计算,这意味着,中国员工每周平均的实际工作天数已超过 5.5 天,平均休息不到 1.5 天;一年 52 个星期,不可能真正双休 104 天,而是不到 78 天。

若考虑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在工作时间上的明显差异,那么,更现实具体的我国员工真实“工作—休息”状况,恐怕还会更加逼仄、“骨感”。比如,以公认“勤劳辛苦”程度最高、同时也是数量极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据《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 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 25.4 天,每天

工作 8.8 小时”。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工每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223 小时,按 8 小时工作制计算,相当于每月工作 28 天,休息 2 天。一年休息不到 30 天,即使加上 11 天假日,也不过是“干 10 天,休息不到 1 天”。

而与此鲜明反差的又是公务员群体。如此前媒体曾调查报道,“目前全国各地政府公务员每天时间普遍不足 8 小时”,一些地方政府机关规定的工作时间往往只有 7 小时甚至 6.5 小时。这意味着,按 8 小时工作制计算,公务员实际享受的休假时间已超过“一周双休”,如果再考虑到“带薪年假制度执行最好的是政府机关”的背景,对于公务员来说,“干两天就休一天”不仅早已实现,甚至还远不止于此。

就此而言,“干两天休一天”背后所折射的“工作—休假”配置,其实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是不同中国员工之间休假权益福祉水平悬殊不均的差距。

## 防火灾,还是等火灾

■叶前 付昊苏

广州市中心一高层建筑持续 12 个小时的大火被扑灭。继北京小武基村和深圳荣健农贸市场两场火灾后的这一场大火,引人深思。

接连发生这几场大火,特征有些类似,就是隐患早就摆在那儿。一些监管部门甚至事后称,“某某地方发生火灾那是迟早的事”。明知有火灾隐患却不及时整改,有关部门究竟是在防火灾还是等火灾?

广州市中心的高层建筑烂尾 18 年,三年前就已收到投诉,明知其没有取得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明知其违规出租用于易燃物仓储,政府有关部门也多次明确其为火灾隐患重点单位,火灾发生前两个月当地主要官员现场督查提出

整改要求……然而,这些都没有换来真正的整改。这样的火灾,说是“等”来的,实不为过。

11 月 19 日北京朝阳区小武基村大火造成 12 人死亡,起火的仓库主营汽车配件,经常堆放纸箱等可燃物,遇难人员平时就住在仓库的院子里。12 月 11 日深圳市荣健农贸市场大火目前已造成 16 人死亡,着火点是违规临时建筑,致人死亡的商户多为生产经营、仓储、住宿“三合一”场所,救援现场消防栓没有水。这些火灾原因,与其说是隐患,不如说是“明”患,没有被消除的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火灾隐患变“明”灾,原因多种多样:整改耗时耗资、非一时之功,于是有些公务人员就心存侥幸,绕开“难啃的骨头”,把“地雷”留给下一届;有的地方面对消防隐患整改,各路神

仙“打招呼”、当“保护伞”,火灾隐患反而“老虎屁股摸不得”。更令人揪心的是,在现行消防问责体制下,基层消防人员发现火灾隐患并提出整改意见,事后因火灾隐患未能及时排除而发生火灾的,要比不知情的责任更大。结果基层人员甘做“鸵鸟”,又或者佯作不察,任凭火灾隐患丛生。

一些事故发生之后,人们总是发现在之前早已埋下了“地雷”,只差时机一到就会被引爆。比如日前发生的“11·22”青岛输油管线爆炸事故,其深层原因在于,事发地的输油管线与市政管网埋设确实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结果付出惨重的代价,其伤痛至今难平。

火灾之后,可以预料一些地方将进行“地毯式”、360 度无死角排查。但是,如果这种排查和治理是玩绕开“难啃的骨头”的游戏,则必然陷入“整治—反弹—整治”的循环怪圈,必然会“等”来新的火灾和其他事故。地方政府和消防部门必须对火灾隐患“零容忍”,坚决发现一处,消除一处。

## 疫苗封存易 疑虑化解难

■燕农

报载,湖南两名婴儿在接种深圳康泰公司生产的乙肝疫苗后死亡,引起各方关注。食药监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同批号产品销往地的湖南、广东、贵州三省暂停使用。广东购进的相关批次疫苗,被使用的 190 支未接到不良反应报告,剩余库存均已被封存。涉事企业回应,暂不能确定疫苗与死亡有直接关系,其他批次产品仍在正常使用。

在接连经历了几年前山西“高温暴露”疫苗风波以及江苏狂犬病假疫苗事件后,疫苗在公众心目中的安全感曾一度急剧下跌。虽说前述事件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心中的阴霾显然还没有完全退去。这种情形下,如何处理此次的“疫苗事件”,考验着食药监和地方疾控部门以及涉事企业的危机处置与公关能力。

某些批次的疫苗涉嫌了不良反应事件,停用、封存并展开调查显然十分必要。涉事企业也比较坦承,一方面等待专家组做出调查结论,一方面自身也进行了更多的安全性试验,希望尽快查明原因。但在我们目前处置“问题疫苗”的习惯性语境中,包括企业和疾控部门在内的一种论调却值得商榷——“其他批次产品仍在正常使用,希望市民放心”,即使事实的确如此。

人们总希望疫苗是“完美”的——既能保护所有接种者,又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预防接种不良事件进行总结时写道:“现实总非完美”。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在疫苗接种上都努力向公众传递正确的声音,以防“疫苗犹豫”发展成“疫苗抵制”,造成疫情在未来几年后集中爆发,譬如英国今年爆发的麻疹疫情,就可以追溯至十年前的“疫苗抵制”。

但是,在发生“现实总非完美”的事件后,国外一般会审慎有余,而不是再笼统强调“放心”之类的“正确声音”。还拿英国举例,2009 年出现首例注射宫颈癌疫苗死亡案例,在不能确信死因与疫苗注射有关的阶段,英国卫生部门暂停了这项国民接种计划。这种暂停是整体暂停,而非暂停某个批次疫苗的使用。事实上,暂停是为了打消民众的“疫苗犹豫”,等待调查结果重建疫苗信心。以此来看,身处漩涡之中仅凭一句“希望市民放心”的表态,恐怕未必能化解市民揪心的“疫苗犹豫”,有关部门和涉事企业不妨再做得彻底一些。

延伸一步看,很多国家对疫苗生产、存储、运输、监测和使用的监管,要比药品严格得多。譬如,在英国只有 7 家生产商获得卫生部门的疫苗生产资质,政府部门直接负责疫苗的安全性;在德国运输疫苗要动用类似于运输“生化武器”的装备——“疫苗冷链”;在加拿大,一旦疫苗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医疗数据库准确、迅速地全部召回。

比诸于此,不能不说我们在疫苗安全链的监管上,仍有改进的空间。在体制的源头上,倘若市场放得太开,监管力量又跟不上,让纯市场主体去承担公共安全责任,民众对疫苗就难免不放心。所以,化解流布于民间的“疫苗犹豫”,除了严谨调查与处置个案之外,还需要在疫苗安全链的体制上有所调整。